

藏语中的借词

〔美〕劳费尔著

赵衍荪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

1981

藏语中的借词^①

〔美〕劳费尔著

赵衍荪译

目 录

导言	(1)
I、释汉藏语	(4)
II、词汇	(18)
1、印度语借词	(18)
2、波斯语借词	(31)
3、阿拉伯语借词	(37)
4、回鹘语借词	(38)
5、突厥语借词	(41)
6、蒙古语借词	(43)
7、满语借词	(47)
8、汉语借词	(47)
A、古汉语	(47)
B、现代汉语	(53)
9、葡萄牙语, 英印混合语, 英语, 以及俄语借词	(62)
附录 I、汉语中的藏语借词	(64)
附录 II、英语中的藏语借词	(66)
补遗	(68)
附注	(69)
索引	(82)

本文所使用的略语如下

Chandra Das = 达斯, 《藏英字典》(Das,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A. von Le Coq, Turfan = 《吐鲁番一带的格言和诗歌》(Sprichwörter und Lied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rench Dict. = 《西藏天主教会编藏语、拉丁语、法语三合字典》(Diet. tibétain-lat-in-frança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catholiques du Tibet)。

Huth, B.M. = 《蒙古佛教史》(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lei)。

Jäschke = 叶斯开, 《藏英字典》(J.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Kovalevski = 科氏, 《蒙语、俄语、法语字典》

(K., Dict. mongol-russe-français)。

Mong. Pharm. = 《蒙古药名》(Mongol Pharmacopœia)

Pol. D. = 36卷本, 《御制四体清文堂》△②

(Polyglot Dictionary, i. e., Yü č'i se t'i ts'ün wen kien 36 Vols)。

Ramsay = 拉姆塞上尉, 《西部西藏: 包括拉达克·瓦扎拉特地区在内的语言和民俗实用字典》, 拉合尔, 1890年版 (Western Tibet;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the Language and Custom of the Districts included in the Ladak Wazarat by Cap. H. Ramsay Lahore 1890)。

Rocco = 三卷本《罗埃罗喀什米尔、小西藏、中央西藏和新疆旅行记》, 都灵〔托里诺〕1881年版 (Ricordi dei viaggi al Cashemir, Piccolo e Medio Tibet e Turkestan in varie escursioni fatte da O. Rocco dei Marchesi di Cortanze, 3 vols Torino, 1881)。

Tib Pharm = 《番汉药名》△ (Tibetan Pharmacopœia Fan Han yao min)。

Vigne = 二卷本, 维恩, 《喀什米尔、拉达克、依斯卡尔多游记》'1842年伦敦版 (Travels in Kashmir, Ladak, Iskardo, by G. T. Vigne, 2 vols, London, 1842)。

附 劳费尔著

- 一、《藏语中的借词补注》…………… (93)
- 二、《印度支那语言中的前加成分A—》…………… (98)
- 三、关于劳费尔生平的资料…………… (115)
- 四、劳费尔本人在《藏语中的借词》一文中所使用的拉丁转写字母与藏文字母对照表…………… (117)

①本文原作(《LOAN—WORDS IN TIBETAN》)见1916年出版的《通报》(《T'oung Pao》)杂志。

②目录中有△号的是原书中加注的汉文书名一译者。

导 言

我本来只打算就藏语中的汉语借词作些探讨，但是，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我就感到仅局限于这样的范围不足以充分圆满地解决问题。仅凭藏语中存在汉语成分这一点，还不能得出这些渗透成分都是直接从汉地进入西藏的判断。我们在中央亚细亚所碰到的语言混乱情况，多多少少都与汉语影响有关，这也是因为许多汉语词曾经是通过突厥方言 (Turkish idioms) 的媒介而从新疆 (Turkistan) 传入西藏的原故。如，*pag-ši* 一词 (见后面“词汇”第157号)，其基础为汉语，是西藏人从回鹘语 (Uigur) 中吸收的；而 *yam-bu* 这一个也源于汉语的词 (第164号)，是从东突厥语 (Eastern Turki) 中传到他们那儿的；还有另外一些传入伊朗的汉语术语，甚至是辗转经波斯或印度才达到西藏人那边的 (第120号)。相反地，有些藏语词却被误解为汉语词，如，*stod-ja* (第107号)，它其实是个来自印度的一种土语的藏语词。*a-p'im* (“鸦片”；61号)，这也是个实际上来自印度而容易被误认为汉语的词。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说明要想使问题获得圆满的结果，实在有必要就藏语中可能见到的所有的借词，作一番彻底的调查研究。因此，在下面，我们对印度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回鹘语，突厥语 (Turki) 蒙语，满语，汉语，以及葡萄牙语，英印混合语，英语都一一加以探讨。虽然，在本文中所能讨论到的，也仅仅只能是那些藏语中一般地被使用的借词。每一方言都自有其特殊的借词，要想都加以研究，还有待于我们方言辞典编纂学知识的进一步提高。西南边境地区的前沿语言都受到流行在那一带的各个印度阿利安语 (Indo-Aryan) 的言语形式的影响。据库宁汉 (A. Cunningham)，藏语 *t'ul* (“蛋”) 为克什米尔 (迦湿弥罗) 语 *kaemiri* 词，没有疑问，在拉达克语 (Ladakhi) 中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克什米尔语词。在不丹南部边境地区，许多词汇和成语都来自阿萨密语，孟加拉语和印度斯坦语 (Assamese, Bengali, and Hindustani)，而其北部边境地区所使用的语言却具有一种比较纯粹的藏语形式。² 在喜马拉雅山一带使用的非阿利安语言 (the non-Aryan Languages) 也可能曾经影响西藏方言。象 *be-da* (写作 *bhe-da* 和 *ahe-dha*) 这样一个通常指出身于巴尔提 (Balti) 的回教徒的职业乐师阶层的词，其来源至今仍无从查考。

在1741年出版，由索巴 (*bZod-pa*) 和贡噶顿珠 (*Kun-dga*) * 编纂的名为《丁香宝帐》(*Li-shi gur k'añ*) 的这部辞书中，记载着三个从“衰雄”语 (羊同? *ʔaṅ-zuñ*) (西部西藏古格省 the province of Guge 的古称) 而来的词，——

1. *sle-tres* (《蒙古药书》，第49号: *slitri*，蒙语为 *liduri*)，据叶斯开，“一种攀缘植物的名称”；和汉语“苦参” *u-sōn* 相同，黄槐属 *Sophora flavescens*，是一种药用的苦根植物，雷曼 (Rehmann) 加以描述并称之为 *lidri* 的那种根状植物也与此符合。³

2. *tres-sam* (或 *tre-sam*)，一种粉末状药物，(与 *ʔye-ma* 相等)。引自同一著

* *bZod-pa* 索巴，义为“忍”，似不是人名；*kun-dga* [*dōn-grub*]，义为“庆喜义成” (按旧译例，*dga* 应作 *lga*)，音译是“贡噶顿珠”。一译者

作的kru-kru-tres这一词条中，也有和梵语Citraka相同的这个tres词素。

3.čur-nis (叶斯开: čur-ni)，而粉（仅用于医学著作）。达斯(Chandra Das)认为此字源于梵语。

从印度吸收的借词当中，纯为梵语语源的那些词只居次要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采自印度土语中的词汇。从其中，阿婆布琅沙语借词(The Apabhraṃṣa loan-words)才第一次被划分清楚。

藏语中伊朗语借词全部来自波斯语，不是来自帕赫拉维语或粟特语(Pahlvi or Sogdian)*。唯一可考的帕赫拉维原型词，可能就是部族名称Tadžik(波斯语为Tazi)。此词藏语的音译转写词(transcriptions)是Ta-Zig，或更加藏语化一些，则写为sTag-gzig(Ta-ši[*džik] 汉文是“大食”)。这个藏语名称通常就是指波斯或波斯人，还有较少用的Par-sig一词，所指也和这个藏语名称相同。达若那他(Taraṇātha)*使用的Ta-zig一词也同样与印度的莫卧儿人(the Moguls of India)有关系。要判明波斯语借词的迁移路线是困难的，许多借词可能来自印度斯坦语，其他可能属于更早期的借词，大概是在西部西藏和波斯文明直接接触之后进入藏语。阿拉伯语词部分借自印度斯坦语，部分借自波斯语，它们或许是由回回商人传到西藏的。有些藏语中的借词以前被认为是蒙语。现在，由于在新疆发现了新的资料，我们的回鹘语知识大增，知道蒙古人曾从回鹘语借入大量词汇，因此可以断言，有些过去被当做是蒙语的借词，其实原来都是回鹘语词。

藏语和蒙语语词的关系并非总是容易明了的。在两种语言中，有一些相同的词汇，但是，蒙语从藏语借用的词多，而藏语从蒙语借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所以何者为借方，何者为贷方，往往不容易判断清楚：这种情况，拿藏语ža-la, žal, žal-ba, šal-ba(“三合土地面，土泥砌棚的墙”)和蒙语šala(满语为jelenen;《御制四体清文鉴》*，20，第3页)对照就可以看出来。

汉语借词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前一类中所显示的古声母和韵尾，它们仍然是唐代的汉语的特征，并且一直是明显地在藏语中保存了下来。这些词是古汉语语音情况的活生生的见证，对汉语语言学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特别引起汉学家的注意的，可能是以藏语的流音韵尾代表汉语韵尾t或k的事实：pir之对*bit“笔”(第229号)，par和spar之对pat*“八”(第230号)，yol之对*yüet“月”(第227号)，gur之对*gwok“国”(第228号)，以及译音的sar之对*sat“萨”等。同样现象在两种语言的同类的词上也可以见到，比较藏语dar和汉语*dat“达”。如果说藏语中的早期借词是根据严格的规则固定下来的话，现代汉语的音译转写词就显得比较武断了，这也许是由于很多现代汉语语词是根据汉人口语，主要是根据汉语四川方言(绝大多数西藏的汉商都来自四川²⁾译音之故。最有趣的是，有些借词具有两种形式——一种老的和一种现代的音译转写形式，——这就正好说明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情况。无论在这一方面或其他任何方面，我试图要做的都未臻完善：许多借词目前只得暂时略而

* 达若那他为《印度佛教史》一书的作者。——译者。

* 以下简称《四体文鉴》——译者。

不提，因为它们的来源尚难追寻。

在《通报》(1914年第89页)上，我曾将藏语mog-ša“磨菇”的nog和汉语mo-ku“蘑菇”相比较，虽然，这也未必相等，因为mo“摩”这个成分总是不带塞音韵尾的。联合词mog-ša，只限于西部西藏使用，不可想象那儿会受汉语影响，此词藏语一般说为ša-mo，口语也可说为ša-maṅ，它似为纯粹的藏语词。而且，汉语“磨菇”也不大可能是汉语固有词，正如施密德(P. P. SCHMIDT)⁶提出的，此词可能借自蒙语mu gu，喀尔木克语(Kalmuk按喀尔木克即卡尔梅克，为蒙古族一支系，为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后裔，其大部分在苏联境内。其文字即托忒文，见于《西域同文志》——译者)为mögö(索伦语Solon为mogu，通古斯语为mogo，满语为megu)。供应中国的最好的菌类食品，至今一直还来自蒙古。

我曾在《通报》(1914年，第90页)上，大胆地作过解释，认为藏语se(或seu)-gbru(“石榴”，或安石榴属Junica granatum)⁷不见得就是汉语ši-leu的音译转写词。汉语“石”，以前带喉塞韵尾，音译藏语为šik(第226号)。而且，在《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林木部)中，我们看到，梵语dāḍimva(dāḍima)-vṛksha“石榴”的藏语译文是bul-poi seu-šin，意思是尼泊尔的石[榴]树(seu tree of Nepal)。叶斯开把单纯的seu字当作“石榴”的名称，但是词素se，seu根据藏语植物学命名原则却可以更广泛地应用。它的主要意义为“刺，刺灌木”：se-šin(“当藩篱用的灌木树”)，相当于“山栲栳”(满语为sira mo，蒙语为ukhana sibtur；见《四体文鉴》29，29页；还未鉴定，但汉语“山”，清楚地表明所指为野生植物而不是指栽培的植物品种)，se-luṅ“刺”(《西域同文志》：察赫E. VON ZACH，《词汇论文集》lexic Beiträge，卷三，111页；又同书，127页，可知se意为“果树”)，因此，派生词还有se-ba“玫瑰”和g-ze-mu“蒺藜”(tsi-li, Tribulus terrestris，一种刺果，《四体文鉴》，29，第15页)。seu šin这个术语，也被鉴定为汉语的“杜李”(野生梨或浆果，pyrus baccata；满语为uli，布里亚特语Buryat为ulir，蒙语为ūril；《四体文鉴》，28，第54页)。此外，seu dmar ḍyn(“小红seu”，也是一种浆果)和汉语“櫻桃”满语ingduri，蒙语ingdör(同上书)相合；rgya seu(“中国的seu”)和汉语的“花红”(“苹果”，Pyrus malus)，满语的aikan uli，蒙语的kitut ūril(同上书)相合；dreñ siu šin(“榛子”hazel-nut)和汉语的“榛子”相合；⁸sba siu(“一种红醋栗”)和汉语的mao t'ēn tse“茅藤子”，蒙语的ūkārūn nidu(“牛眼菊”)，满语的jali相合；siu nag(“桑”)和汉语的“桑”(《四体文鉴》，29，第22页)相合。从这些不同的名称看来，我们有把握认为，se或seu是本地语词，se-gbru意思就是“se种籽”。《翻译名义大集》中所列的这个术语说明石榴是从尼泊尔传到西藏人那儿的。⁹柔克义(W. ROCKHILL，见所写的日记第310页)用我所不能解释的藏语词supoñ称呼这种果实。蒙古人使用的藏语词写为simbru，此外，他们曾从波斯语把anār انار一词采取到自己的语言中而念为anar。

没有必要把藏语srañ(“两”)和汉语“两”联系在一起。因为srañ还有“平衡，杆称，重量”的意思，它可能是从动词sroñ-ba(“校直”)演变而来，因此是地道的藏语词。sa-t'ē这个奇特的名词迄今只能在达若那他的著作中去考证，格吕恩魏德勒

(GRÖNWEDEL) 认为这个词源于汉语的 *sjao t'añ* “小堂”¹⁰, 这种推想是不可能的, 汉语的 “堂” *t'añ* 仅只能用藏语的相当的 *tāñ* 这个音来译写。所以这个名词肯定不是汉语词。

释汉—藏语

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作用的关系, 在汲取了从印度涌入到南部边界和来自汉地向东渗透的思想意识之前, 西藏的精神文化就成为一种具有两重特性的精神文化。谈到外部影响的这两种潮流, 印度的思想意识的浸渍向来总是一个被人特别重视并当做是科学研究中最吸引人的课题, 这就是这么多的研究西藏的项目之所以通常仅仅被当为梵语语文学的旁支或辅助的科目的原因。汉语文在西藏文化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则几乎完全被忽视了, 并且至今也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注意。然而, 甚至在乔玛 (Csoma) * 之前, 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早就为眼光远大的克拉卜罗斯 (KLAPROTH) 指出了”¹¹, 他认为, 西藏文学是西藏和汉文学的混合产物, 很多汉文的历史, 天文, 医药以及其他科学的著作曾译为藏文, 很多种手艺也伴随着印刷术从汉地传进西藏。印度部的图书馆馆员托玛斯博士 (Dr. F. W. Thomas) 在 1915 年四月来信中对我说: “利用从汉文资料中获得的有关西藏的情报, 对于我们这些主要地是从事印度或梵文的研究的人而言, 确乎是件难事, 在一些事情上, 我个人感到必须从汉语文方面得到启示: 谁都不能不察觉到, 汉语文的影响其实是非常之大的。”既然有一种藏—梵语文学, 那么也就同样有一种汉—藏语文学, 因此, 有一些问题这儿要从汉语借词这个题目入手简略地加以讨论。为此目的而利用的材料也将同时予以标注。

汉语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西藏的历史编纂法方面。印度传播宗教思想给西藏, 但是, 她本身缺乏一种治史的精神, 所以在记载历史的方法上没有什么经验提供借鉴。只有汉人, 以他们在历史大事变中对事件和日期的记录的敏感, 而成了藏族治史时效法的老师。柔克义¹²认为, 西藏人在热巴巾 (816—838) 王朝开始编纂他们的民族史, 他似为西藏的第一个颇关切国家的编年史工作的王, 他曾经按照中国年代学的系统¹³, 记载了他的王朝的历史大事。根据藏文编年史《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第96叶)¹⁴, 这种看法现在是可以更确切地肯定的, 在这部著作里, 我们看到夹在热巴巾王的历史记述中有一段这样的说明:

“此一叙述汉藏历史的著作 (《汉藏史册》rgya bod lo-rgyus deb-t'er) 系中国太宗皇帝¹⁵时史官宋祁 (汉) Su k'yi-han¹⁶ 所纂, 书中史事均按王位继承顺序记载。此著作编成后即在临洮 (Sin-kun) 大寺由汉人译师 (lo-rts'a-ba) 吴江祖¹⁷ (U Gyañ-dza) 译为藏文。书中汉、藏历史年代虽不尽相符, 且在彼此时代人名的记录上亦有若干矛盾, 但荣获 “国师” 封号的仁钦扎 (宝称) 喇嘛 (Lama Rin-č'en Grags)¹⁸ 在其旅居汉地时期, 曾尽其所能对汉、藏交往关系, 根据有关西藏和汉地的历史记载予

* 亚历山大·乔玛·古罗斯 (A. CSOMA KÖRÖSI) 十九世纪中叶最早科学地研究藏语文的匈牙利东方学者——译者。

以核对。在阴木鸡年（乙酉）¹⁹，他在临洮（Šiā-kun）大寺写成的一本书中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使这部著作公诸于世。此处所提出的只是一分选录，²⁰如有详细研究汉藏交往关系史和甥舅关系史的人，²¹可读一读那一著作的全文。”

西藏和汉地的历史整理工作似在堪祖得赞热巴巾（k'ri gtsug lde btsan Ral-pa-cān）时代即已进行，因为有关他的统治的一章中，《西藏王统记》插入一部分相当长的和中国史书相同的有关西藏大事的议论。事实上，这是一章十分概括的纲要，它尽可能地根据仁钦扎（宝称）喇嘛所著的书，按囊日松赞王（king gNam-ri sroñ-btsan）时代起至热巴巾王时代止的顺序排列，其中且有一部分和《唐书》非常相符。当宋祁（汉）由于编纂的需要而利用了唐朝第一手的卷宗和国家档案材料之时，仁钦扎（宝称）喇嘛在编书之际似乎也采用了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书》上的材料。支持这个意见的最好的证据是原文中关于松赞冈布王（king Sroñ-btsan sgam-po）驾崩日期的记载，其所确定的日期为“阳铁狗年”（庚戌léags p'o k'yii lo），和650年相合；而《唐书》中所指也恰是这个年代。²²《西藏王统记》让他多活了几年。萨囊彻辰（Sannang Setsen，《蒙古源流》作者——译者）却使他死于698年²³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从汉文记载而得的年代对西藏历史家并不产生任何影响，《西藏王统记》说到的关于那个国王的朝代的篇章中也没有记载这个年代；这个事例，的确反映了纯粹的西藏传统。所以，情况不是说这部“西藏的编年史”（我仅以自己的经验就《西藏王统记》这一特指的著作而言，并无把这样大的一个课题都一律以这样的看法加以概括之意）应该表现为藏汉的两种传统的大杂烩，而是说每个集团的传统都分别地被反映出来罢了。在提到的上而这一插入的段落的开头部分，题为《[唐]书吐蕃传》（žu t'u han čan）的汉文著作²⁴被引用了，因为此书提供材料说，释迦牟尼后1566年国号称为“唐”的中国王朝崛起了，此朝与吐蕃王囊日松赞同时。”引文中后一句估计不会是汉文原著中的句子，因为《唐书》中没有提到过这位国王，松赞冈布的父亲。因此，关于松赞冈布和他对吐谷浑（T'u-lu-hun）的战争一段，我以前就按照藏文原书翻译了²⁵。这段原文和《唐书》中的相应的叙述是如此的相似，所以在对材料重新审查之后，我就似乎不免有藏文的注释是从汉文抄录而来的这样结论。这是由于它符合上述汉文记载的松赞冈布的逝世年代这一点而予以肯定的。然而，应注意藏文记载中由于有不同的两种《唐书》T'añ šu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说国王曾进军到一个名为T'un čin（亦即T'un ču）的地方；另一种说法说，他曾把军队交给打败过吐谷浑（又写为T'u-yü-hun）的名叫“羊同”（rYāñ-t'uñ）的官吏指挥²⁶。汉文原书在这儿提到一个和那个国王统一他们的军队，一起攻打共同敌人的“羊同”（Yāñ t' uñ）部族，这一件事使人费解，这两个名称显然相似，但是，毕竟可能还是一种偶合。然而汉语原文中其他记载都是为西藏人所确切理解的，以这样特殊事例，就说人家犯了误解原文的错误，那就似乎是不合理的指责了。这儿也许有人篡改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或者利用的可能是除《唐书》之外的另一种汉文材料。

《甘珠目录》²⁷（the Index of the Kanjur）明确地表明，第一部在欧洲编纂的西藏文学著作，《本生经》（Jataka）的一个集子的《贤愚因缘经》（mDzañs-blum）其本身是以译自汉文的经集出现的，乔玛²⁸和席弗纳尔（SCHIFFNER）²⁹也根据《甘

珠目录》而有同样的看法，席弗纳尔还在梵语名称的藏文译文上发现中国的影响，他见到有少数藏语词是汉语音译词（他称之为“转讹体”）；但是，实际上古汉语韵学在他那个时候完全还未被人通晓，所以他的研究没有获得成果，甚至有一些地方还有错误。高楠顺次郎（J. TAKAKUSU）³⁰一反其以前汉文可能是藏文译文的看法，最后力持藏文译文系根据汉文翻译的论点。他比较了这两种文本中的一些藏汉文名称，作为它们之间有相互关系的证明。这些比较的词汇所具有的无可怀疑的价值，从著者本身的角度看来都是未曾意识到的。藏文译文给我们以西藏人音译汉语语音的方法上的有趣事例；如果我们不知道藏文译文译成于九世纪初的事实，只根据这些译音字所记录下的语音恰和唐代语音一致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得出一种结论，认为用藏文翻译的时间也应回溯到同样早的朝代。试以汉文“婆罗摩达”（梵语为Brahmadatta）译为藏语Ba-la-ma-dar³¹为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些音节的在唐代记下的实际语音——至少可以说，在那个时候，这个词就能够尽藏文之所及而准确地音译出来了。可惜我们还没有藏文译文的精确版本，施密德本很不足为据，席弗纳尔的补注修订也并非定论。从事于九世纪这一著作的藏文原稿和同时期的汉文本的校勘工作会使人赏心悦目。即使今日的藏文版上有这么多的外误，要在某种程度上推本穷源，看来也还不是一件无望的事，分隔点（ts'eg）在藏文书写中常标错：（Tsuu-ba-na-ta）³²这名字显然应写为Tsuu-ban-ta（甚至应写为Tsuu-pan-ta）³³，而译为öu-li-pan-tö“周利盘多”（梵文为Cūḍapāṇhaka）³⁴。同样适用于A-na-ta一词，此词改写为An-ta，译An-da（An-t'ö）“安陀”梵文为Andhra；此外，kan₃（写为ka-na）-ja-ni-pa-li，译kan-ja-ni-pa-li“虔闍尼波梨”，梵文为Kañjanipālī。³⁵上面后一个例中藏文以ja音译“闍”最引人注意，由于ja的发音，又提供一个这个字的唐代独特念法的证据。根据汉语的同义词，其他藏文名称也可能正确地得到复原。席弗纳尔³⁶对Ba-mi-su-tra这个名字很感犹疑不定，虽然他本人也和施密德一样揣测为Vasumitra。根据相应的汉文“婆修密多罗”*Bwa-su-mit-ta-la，可知藏文原来也必为Ba-su-mi-tra，只是后来由于抄写者把su和mi写颠倒了。席弗纳尔在他对施密德的版本所作的很有价值的补充注释之中，曾试图在梵语同义词的基础上使一些名称的读音还原。但如今事实证明他的这些修订并不总是为人们所接受，在施密德版本原文中记载的名称，只要对照它们所音译的汉文词语，就可以看出它们是译得对的。席弗纳尔³⁷提出，根据梵语cibi这一形式，应念为ši-bi而不应念为ši-byi。这种提法或许很好，但西藏译师眼前所见为汉文“尸毗”*ši-b'i，力求完全准确他就以藏语ši-byi音译。这决非仅此一例。在藏文本中至少还有三处是以byi翻译汉文“毗”*b'i（p'i）的。³⁸这些译音词指明所使用的字母y，其作用在于表示它所附着的辅音念时要腭化。³⁹所以ši-byi这一念法，虽然用来译梵文Cibi，这也是恰当的，而且没有疑问，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中就是这样的。基于相同的理由，我想，ka-byin或ka-pyin这一名称无需复原为ka-p'i-na⁴⁰（梵文Kapphiṇa旧译“劫宾那”，人名，佛弟子一译者），但最好写为Ka-p'yi-na。在Piṇḍoladvāja中的pin，汉译为“赛”，在藏文里就译音为p'yiṇ。

藏语音译转写词的最有意思者，是sar p'ag之译汉语“萨薄”*sat-pok或sat-bak（sa po）。施密德视此词为专有名词。席弗纳尔查对蒙文本，⁴¹发现其中有yākā sarta

waki, 就推测为梵文 mahāsār-thavāha (“批发商”)。高楠顺次郎本人未曾利用 席弗纳尔的著作, 他据汉语的 sāt-pak 而推想为梵文 sātpati (“好主人, 好君长”), 认为此词藏语有 “管家” 或 “主人” 之意。不管怎样, 此藏语词是一汉语音译词, 原来可能是 sar-pog (字母 p 和 p' 很容易混淆)。席弗纳尔的结论是据列维 S. LEVI⁴² 编注的《大孔雀明王经》(the Maha-mayūri vidyā-raññi) 的舆地名录证实的。这儿我们碰到 Sathavāha 这名称⁴³, 汉文本中其相应的词为 Sa-t'o-po'-ho “萨陟婆诃”, 被解释为 “商主”, 以 ded dpön (“商行掌柜”)⁴⁴ 译为藏文。可知它是据上述 sa-t'o-po'-ho 一词而缩写为 Sa-pō, 而且确是做梵文 sārthavāha 而写成的。⁴⁵ 此梵文词在现代藏语词 śa-pō 或 śa-bō 上留下痕迹, 意指商店经理, 特别是指和汉商同居并且替他们做买卖的西藏妇女。正如柔克义所说那样,⁴⁶ 此词与东部藏语词 śa-bō (“朋友”) 无关, 它不能用之于妇女 (如 śa-mō, “女朋友”)。此词还可与《法文字典》982 页的 ts'ōñ śa-po (“商人”) 比较。

在施密德版三十七章 (原文, 第 264 页; 译文, 第 331 页) 就到了一个名为 Ba-si-li 的摩布洲 (Jambudvīpa) 国王, 此名称特别有意思, 因为席弗纳尔⁴⁷ 倾向于把它和希腊文 βασιλεύς 等同起来, 然而此结论稍嫌轻率。汉文本⁴⁸ 称此王为 “波塞奇” Pō-sai-ki (Pwa-sik-ki; 梵文 Vasuki?), 所以将藏文音译转写词 Ba-si-li 当做 Ba-si-ki 的一个近代的错别体是可以的。总之, 席弗纳尔的推断很难成立。在近代的藏文版本中还可见其他一些多多少少残缺不全的名称, 一如 Leu-du-ḡi 或 Leu-du-ḡa, 一个婆罗门的名字, 席弗纳尔⁴⁹ 认为就是 Rūdrakṣa, 它和汉文同义的词是 Leō-tu-ḡ'a (Lō[rō, ru]-dak-dza) “劳度”⁵⁰。这儿我们看到一个说明问题的好事例, 和伯希和的意见⁵¹ 相反, “度” 确系被用来音译 dak 这一音值的。kyun-to⁵² 这一名号席弗纳尔曾⁵³ 鉴定为是梵文的 Cuṇḍa。从语言学观点看来, 这是不足取的。诚然, 汉文本⁵⁴ 所提供的 kiān-t'i “均提” 一词, 看来似可回复到梵文原词 kuṇḍi, Kuṇḍin 之上。Kun-to⁵⁵ 这一动物名称, 其梵文词源还未探索到, 在汉文本⁵⁶ 中则写为 kū-t'ō (ku-nda) “锦陀”,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 最初的藏文音译转写词也应写为 *kun-da。

这说明一个问题, 为了《贤愚因缘经》的再版, 特别是为了专有名词的拼写, 汉文本必须仔细地加以利用。可惜我们现有的汉文本, 已经有了一些改动, 而且正如高楠顺次郎所认为那样, 其中还有若干讹误。但是, 这位学者认为, “西藏译师所本的汉文本似有相当讹误, 而且其中还包含了许多奇特的汉文错别字”。⁵⁷ 这种看法我是不同意的。此外, 他所写的标题 “由不懂汉文原著的西藏译师所译的译音本”, 我更不以为是正确的。高楠顺次郎在这儿所提供的异常圆满的藏文音译转写词, 绝大部分均与古汉语音韵相符。如果说西藏人以 śiñ-rta ḡ'en-po (“巨擘”) 称呼国王, 而汉文中现在还有 “摩诃罗睺那” (梵文为 Mahāratha) 这一名称, 则可知汉文本也是在以前根据 Mahāratha 的读音转译的。所摘引的例子使我确信, 佛教徒译师们的藏文译音词, 是根据一种按唐代汉语实际语音情况确立的正规的体系译定的; 所以我还不禁认为, 拿古代藏文本《贤愚因缘经》和相应的古代汉文本相校证, 就会看到这两种文字的经本之间有完全符合的地方, 只是由于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已经自然走了样吧了。我希望我的这些看法还将证明, 要很好的研究译自汉文和藏文佛教著作, 汉语文知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⁵⁸

除《贤愚因缘经》外，其他的《甘珠经》著作也曾由汉文译来⁶⁹。贝克在他的有用的《柏林手写本甘珠经》目录⁷⁰中，已对藏文原文中的汉文书名有所注意，并曾藉缪勒（F.W.K. Müller）和绪尔（Hüller）之助试图予以复原。贝克根据他所研究的《甘珠经》版本里面所记录下来的一些书目，原样不动地使它们得到保存，他这样做在原则上说来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不停滞在这一点上，当这些书目已准确地按照它们的汉文原称得到了复原之后，就总有可能校正确因许多抄写者抄得变了样的那些藏文音译转写词的。他们的最常见而严重的错误，如前所述，就是分隔点（ts'eg）的误植。从《柏林甘珠经》中的汉文书目看到的趣事是，它们比之于施密德编纂的《索引》以及乔玛的《题解》（*the Analysis of Csoma*），则《柏林甘珠经》中的汉文书目是属于一种更近期的译音形式。在柏林版《经》（*Sūtra*），第三十二卷，第7号中的藏文书目，*Tai p'añ pe na hwa pao diñ giñ*，同于《大方便佛报恩经》（南条文雄BUNYIU NANJIO，第431号。按，南条文雄为日本梵学家，著有《大明圣教三藏目录》——译者）。⁷¹所以根据这个藏文书目，可复原为*Tai p'añ pen hu (= hwa) pao ñin (ñen) giñ*。藏语缺擦音*f*，当*f*后的元音为*a*时，就以*p'*或*p'h*译写，当元音为*u*（或*o*）时就以*h*译写。藏文以*hwa*（念为*hu*）译写汉文的“佛”*fu*，所以，此音是在“佛”字不再念为*but*，而已念为*fu*时记录的。在施密德的《目录》中，我们看到，相同的书目，这个译写的*p'ur*⁷²字，乔玛又译写为*p'ur*。缪勒⁷³为了考证“佛”字的韵尾*r*的发音，曾求助于这个音译转写词。由我从事编纂，传自九世纪下半叶的敦煌藏文本《无量寿经》（*Aparimita-ayurjāna-mahāyānasūtra*）之末，我们见到一条经咒*na-mo'a-myi-da*⁷⁴ *p'ur*，这显然是汉文“南无阿弥陀佛”的音译，所以，*p'ur*是唐代汉语**but*的藏文音译，此字也可能念为*fut*，*fur*。很可能藏文是用送气声母来译写汉文的*f*音的，因为汉语的*but*或*bur*西藏人容易念成或写成为*bur*。施密德和乔玛的索引（*Index Schmidt and Csoma*）反映较早期的音译，如“便”的音译为*byan*（代替*pen*），“报”为*pou*，“恩”为*ñin*，和“经”为*kyen*。

柏林抄本《经》的书名旁边附写的*ju*（后跟字母*a*）*p'i ma ti yi*这几个字，曾使缪勒和绪尔的才华黯然失色⁷⁵。然而，要鉴定这些词也是可能的。在甘肃卓尼（*Čo-ne*）大寺印刷的《甘珠目录》藏文书名是用这样的话结尾的，*ham-po bdun-pa leu dgu-pa*，“包括七色九品”。这和南条“七卷九章”之说完全相符⁷⁶。所以，正如乔玛和《施密德索引》⁷⁷中的正确写法一样，*p'i-ma*显然应读为*p'im*，相当于汉文“品”，*ju p'im*意即“九品”。然而，据乔玛和施密德，*su*这一写法似乎指的就是“序”这个字。柏林原文中*ti yi*和乔玛、施密德对照就等于*dei'yir*这两个词。⁷⁸所以，结论是明显的，就是，从汉文“第一”**di yit (ti yi)*的不同的藏文音译看出，柏林本是按较近代的唐音译写，而乔玛与施密德二人的版本则按古代的唐音译写的。还有，*dei*是“第”字的古老的音译，而柏林本的*ti*却反映了近唐的汉语发音。⁷⁹

在《贝克福目录》（*Beck's Catalogue*）第102页，我们见到*Suvarṇaprabhāsa*的音译是这样的：*tai ċ'in gi ma gvañ mñ tsui šin wañ gyiñ*，校正后为*tai ċ'in gim⁸¹ gvañ mñ tsui šin wañ gyiñ*，此系《大乘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音译。按照《施密德的索引》和乔玛的音译转写词，较古老的写法是部分地保留下来了：如“乘”、“明”

之音译为šin, šin和mya^u (比较日语的miyo), “明”乔玛译为med⁷²。施密德把“最”tsui误写为tsai, 这是由于把元音符号 (vowel-sign) u弄丢了的原故; 乔玛以jwai译写此字尤为特别; va zur即半元音v或o, 所以藏语就念为jvi, 在唐代, “最”字上似有一“浊舌面中起音” (an initial palatal sonant)。又, 乔玛以dci译“大”, 施密德译为tä; 前者译“经”字为kyañ, 后者则译为kyin。

Pi du ts'i zin gin是《北斗七星经》的译名。这清楚地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柏林藏本甘珠经》所反映的是一种现代语音情况, 因为它是一种新译的版本。拿这一书名和更古老的书名Bi du ts'id zin gin⁷³比较, 则其中ts'id是汉语“七”的音译, 而柏林本的ts'i, 所代表的却是现代的语音情况。《柏林藏本甘珠经》来自北京雍和宫喇嘛寺, 很可能它也是在该寺写成的, 书中汉语音译转写词多少是据北京音写定的。

据《德格目录·跋》(第124叶)云,《入楞伽经》(Laṅkāvatāra-sūtra,《甘珠经》,《经》,卷五,第3号)中之一章系由管·法成⁷⁴译自汉文⁷⁵,此点与中国法师rBen-hvi写的注释相符。rBen-hvi在柏林本中写为wen-hui,在《施密德索引》中写为wanhvi,即指汉人Wen-hui,与伯希和一样。⁷⁶我在中国著名人物的记载中找不到与此名相同的人物。

在《甘珠经》中,或许还有比其他一些版本上见到的还要多得多的译文系译自汉文原文。柏林本和《施密德索引》对《Atajñanasātra经》(《经》,卷十,第3号)都没有加跋;而《德格目录》注云,据九世纪的《登迦目录》(the Index of lDan-dkar),⁷⁷它是译自汉文之作。这又一次表明,早在九世纪之初汉文佛经著作即已译为藏文;另有一篇没有梵文书名的译自汉文的“德格跋”(the Derge colophon),还证明说它原来是用“老文字”写成的。

正如《德格目录》(131叶b)所说,《正法王大乘经》(Saddharmarāja-sūtra《经》,卷二十二,第1号)也是从汉文译为“古文”的;但是,由于不曾以新文字加以改写,所以就有人对它有怀疑。据《德格目录》,《法海经》(或《大乘法海经》Dharmasamudra-sūtra,见《经》卷二十二,第12号)是译自汉文并用“新文字”编纂的。⁷⁸再,《胜子(佛子)又成经》(Jinaputra-arhasiddhi-sūtra,《经》,卷三十二,第5号)是首先从汉文译为“古文”的。⁷⁹

在《丹珠经》中,我们见到《因明入正论》(南条文雄,第1216号)的藏文译文。

“故宫”版的汉文书名译为藏文g-yen min g-zai (后带-a) čin li lun⁸⁰。这种尝试是近代的;如系古代翻译,则“入”字的韵尾p在藏文中也应看到。带前加字母g的yen字代表高调的“因”字,而平调yen的调值却是深调的。虽然,在译写“入”字时,同样的前加字的出现,是一种破例情况,因为后者具有一种和藏文声母z相当的深调;其元音结构与发音亦费解(双[ai?]后带q)。lii字的双i似标示“理”字的上升调值。在《丹珠经》中也同样以Tai č'in pai ha min mun lun的名目译写《大乘百法明门论》(Ta č'ōn pai fa min mōn lun) (南条文雄,第1213号)⁸¹,这又是一种近代的音译转写,因“乘”字的声母既非舌面浊音dž,“百”字的韵尾也非喉塞音k。译文以h译汉文的f,因藏语缺f音。《丹珠经》中译自汉文的其他著作的书名都只用藏文和梵文书写⁸²。

除了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之外,还有非经典的佛教作品也有从汉文译为藏文的。韦伯和胡特(J. WEBER and G. HUTH)曾编译了一部书,其藏文名为Saṅs-rgyas-kyi

č'os gsal žiñ yañs-pa snañ brgyad čes bya-bai mdo,*《佛法明八广光明己名つくる》⁸⁵。书名前冠有rgya gar skad-du | pañ rkyañ rkyeñ等字。据胡特意见,后面这几字为汉文,他校iErgya gar(“印度”)为rgya nag(“支那”)且把藏文音译复原为p'añ kiah hñ,⁸⁶他认为这和藏文的yañs-pa, gsal, snañ相同。在文章的末尾有一附注,从中可以看出胡特当时对这一假设也是有怀疑的。他曾在施密德和波特林克(Böhtlingk)的《藏文手抄本目录》第463号中看到所列的书名,一个是梵文的aryapadayañyadarta*(附加疑问号)一个是藏文的q'p'ags-pa gnam-sa snañ brgyad čes bya-ba t'cg-pa t'en-poi mdo《天地八阳(光)大乘经》,未入藏“Venerable Mahāyāna-sūtra, called eight phenomena of heaven and earth”)。于是胡特辩解,假如此书与上述著作相同,则上述著作的书名毕竟可能是从梵文蜕变来的,并且,这一著作也可能译自梵文而不是译自汉文。但是他又急于补充说,他的前一假设可能性要大一些,那个书名原为汉文,rgya nag skad(“汉语”)一词后来才和rgya skad(“印度语”)混淆起来,因此就引出了抄写者不自觉地把汉文书名梵文化的情况。然而,这种混乱是可以澄清的。韦伯和胡特所译的《经》明显地表明了汉文影响,他本人也曾指出⁸⁷:天地互相对立⁸⁸,而又暗含和谐的统一,等等。故此书是从汉文翻译的。胡特没有理由得出另外的意见。我从两种北京版本中很熟悉他在《藏文抄本目录》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它的内容和韦伯和胡特的《经》不同,但却同样是一部译自汉文的著作。书中的对“八卦”的详述,对藏文书名中带有中国哲学味道的关于天地(gnam sa)的叙述,——而这些在梵文著作中是不会有的一一,就是很好的证明。我手头所有的这种版本,是以“在汉文里有”(rgya-nag skad-du)这几字开头的,后跟,ārya par yañ gyad rta或,ārya pa-ra yañ gyad rta这一书名,可见这“汉文”书名显然和前面提到的施密德与波特林克提出的梵文书名āryapada-yañyadarta是一个东西:我们只要把d换为r,两者就这样容易混淆,在gya后加进一点,那两者间的等同的关系就建立了。此种蹩脚的梵文(dog-Sanskrit)怎会产生问题,或只得待梵文学家来考虑了。至于我,除首字ārya以外,是不相信那就是梵文的。其余的字是藏文化了的汉文,它们是被无知的抄写者所滥用了。对照胡特的汉文书名,则两个书名的类似情况是明显的。胡特的pañ字等于我们的pa-ra,或par;即汉文的“八”pat字,我们在藏语音译的书名中碰到的这个字写为brgyad。因此下一个词yañ(胡特的rkyañ字),也许就是“阳”字,其藏语的汉语对等词(equivalent)必定是snañ。我们必定念gyañ以代替gyad(与胡特的rkyeñ字相等),此为汉语《经》kin字无疑(见“词汇”,第二百八十八号)。我不知道rta代表哪个汉字;很可能,它只是一个抄手加上去的字,因为汉文“经”字已经是书名的最后一个字了。

史坦因(A Stein)在新疆发现的藏文木简上,似乎主要涉及的是行政的事务,但仅他的影响也同样显而易见,现在我们从早在弗兰克发表的一些随笔就能得出这种判断。

⁸⁷ “有许多词的词义至今还不十分明确”,这些词显然就是汉文。“只要提出一个例

※ 此译名见日本东北帝大目录1067——译者

aryapadayañyadarta此字非纯梵文,可能即《天地八阳神咒经》一译者。

子”，弗兰克说，“我们还不知道，当地地名 Bod（波德），Tibet（吐伯特），Li（李），Khotan（和阗），和数词连在一起时——bod-gnyis, li-bzhi, 等等，——应如何解释，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儿我们所见的确是汉文度量名词，li即汉文“里”，而 bod可能即汉文“步”pa（‘bu, bo “一步，五呎长的陆地计量单位”）虽然后者在汉语中是绝无破败的齿音韵尾的。⁸⁸zan的意思不是指“叔父”，⁸⁹而是汉文“尚”šan的音译⁹⁰。文件中所见的关于礼仪的术语看来都是模仿汉称音译的。假如作者自称“我，无能的人”（bdag nan-pa），我们就会联想到如“寡人”kua zōn，“愚”yü，“敝”pi，“贱”tsien之类的汉文成语和其他“自称之词”。

达斯提到一件汉藏历史上的有意思的事情。⁹¹有位藏语称为Zan-t'an šan ši⁹²的中国（佛教）长老，在接受赤松德赞王（k'ri-sroñ ideu-btsan）的邀请朝拜桑鸢大寺（bSam-yas）之时，因为发现藏文字母表现汉语词的能力，所以他就作了这样的翻译尝试：他把一些汉文著作转译为藏文，然后又译藏文为汉文；把某些藏文著作转译为汉文，然后又译汉文为藏文。在桑鸢大寺发现的一块碑铭上也说，这位长老曾将汉文文件译为藏文。在达斯论文所附的第Ⅶ号图片中，可见这块用汉、藏文字写成的碑铭复制摹本。此碑藏文部分清晰易解（见第285号），汉字部分则破损甚多，令人难于辨读。

虽然，已经有了察赫（E.VON ZACH）的这段经过初步观察后所加的前言⁹³，但《元史》（Yüan shi）中那些隐藏在汉文的外衣下面的藏语词还必须深入研究。从蒙古（元）时代留下来并为沙俄（CHAVANNES）⁹⁴发表和翻译的汉藏碑铭，提供一些汉语词的藏文音译转写的有趣的例子⁹⁵。

看一看藏文的历史著作——譬如，拿胡特编译的《蒙古佛教史》（Hor č'os byuñ）为例，——就足以使人相信这样的事实，在这部分文献中汉语名称的音译转写词数目极多。胡特知道这些词并认识到其重要性⁹⁶，但在他的翻译中没有加以对照订正，因为他曾计划针对他的译文另出一个注释本；不幸由于他过早的去世使计划不能付诸实现。这是极为可惜的，因为许多这样的汉语名称本身不能自明，由于它们披着奇特的藏文外衣除了许多汉学家对之感到朦胧而外，不熟悉汉文的西藏学者，也同样居于对它们陌生的地位。藏文音译转写词是完全按照现代北方官话译写的，所以从汉语音韵学观点看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们并非根据严格的规则译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地写成的。要建立任何一些语音规则，只根据能够鉴定这些音译转写词和它们的汉语对等词这一点，是不可能成功的。历史和地理的观点是指引我们解决问题的唯一准则。譬如，如果把“Yai ho围场的大宫殿”这句话从上下文中抽取出来，可能没有人能够肯定说它究竟应该被理解为什么。只有联系上下文⁹⁷，我们才会明白Yai ho所指即汉文的“热河”⁹⁸。Yo mn yüan似乎就是“圆明园”⁹⁹。这一类的音译所根据的，似乎是不准确的听音，而不是一种汉文书写的知识。不可把Zun šu wan¹⁰⁰当做明神宗皇帝，但书上确有1616年关于他的记载。

要研究西藏钱币学和懂得汉、藏文的钱币铭文的准确读音，必须懂得汉语文。华尔希（F.H.C. WALSH）先生曾著有一本以《西藏的货币》¹⁰¹（the Coinage of Tibet）为名的书，其中在提到其他种类货币的同时，也附图描述到由汉人铸制，在西藏流通的那种中国银元tañ-ka。¹⁰²首次发行的这类钱币背面有藏文铭文“čan-luñ gtsaň

pau”，华尔希先生译为“乾隆的纯真货币”。这里，他把gtsaŋ当作形容词gtsaŋ-ba，“纯洁、纯真”翻译了，这当然是不行的。藏文只不过是钱币正面汉文铭文的音译，原文是：“乾隆藏宝”。意即“乾隆时代的西藏的珍宝”。汉文词Tsaŋ是藏语gTsaŋ的音译，指西藏中部的一省，——中国人把此名称引伸，指整个藏区。因此，钱币上的gTsaŋ和形容词gtsaŋ-ba毫无联系¹⁰³。藏文把K'ien-luŋ写为Č'an-luŋ，与近代Č'ienluŋ的语音接近，这可能与十八世纪流行的语音差不多。无畏空(aigs-med nam-mk'a)在1819年著文时，将此名称译写为k'yan-luŋ¹⁰⁴。钱币上的“嘉庆”年号是bla-ge'ins¹⁰⁵被畏空写为čyā-č'in。“道光”在银币上则写为rDau-kvoŋ¹⁰⁶。

西藏人很喜爱器皿，他们尤其喜爱供佛用的器皿，这类物件上刻有指出其特点的简单铭文或圣贤的格言，有的甚至仅只刻着年号。在北京或一些蒙古城镇里，汉人已开设了特殊的工业以满足喇嘛寺的需要，以迎合一般喇嘛与蒙古富家的癖好。这类器皿上的铭文，有时竟全是汉文词句的藏文音译转写词。例如，在一个式样非常优美的精制青铜酒壶的底上，¹⁰⁷刻着这样的词句：“Ta č'eŋ k'aŋ žes ŋan so”。我就不知道不懂汉文的藏族学者对它会有什么样的解释！当然，如把这些字当做藏文，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它们仅只是“大清康熙年作”几个字的音译而已！

在1768年，遵乾隆皇帝御旨，以六种文字（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喀尔木克文，维吾尔文[回纥文或托忒文]）编纂，使人感到有趣的一种八卷本的地理字典出版了。字典名为《钦定西域同文志》，其中的3111个的中亚地理名词，都附有汉文、满文的译音和词义解释。克拉卜鲁斯曾利用它注释弗兰赛斯哥·欧拉兹欣修士（Friar Francesco Orazio）的《西藏简介》（Breve notizia del regno del Thibet）以及《西藏见闻录》Description du Tibet 第46页）。承察赫的努力发表了其中有关西藏的这一部分。¹⁰⁸久已绝版的这部著作是值得出版的，它不仅在地理学方面，而且在中亚的语文研究方面也是重要的。书中所列藏文名称都经过精心辑纂：它们都是由著者根据可靠的语言材料并以其自己的敏锐的审音能力选录的。可以看出，他的藏文词的音译是根据一个统一合乎推理的系统写成的，因此，据而对十八世纪的藏语语音情况作些推测是可以的，这些情况在那个时期的耶稣会和天主教的凯普钦（Capuchin）教派教士的音译转写词中是可以找到旁证的。他的对名称的译释似乎是在地方传统的基础上写成的，偶然的误解虽然在所难免，但一般说是可信的。¹⁰⁹下面这些解说可能是基于藏文名词的音译转写词而写成的：

除两种情况外，所有的前加字都不发音，qbroŋ“阿博隆”（满语为uhoruŋ）和lōog（“塔”）“罗爵克”（满语为lojiyok），在另一节则音为čök“爵克”。dhyi（“大野猫”）之译写为“伊”yi，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与近代语音相同。

在某些固定语词的组合中前加字是发音的：¹¹⁰

lu-rgan (lar-gan)， “拉尔丁”（老山口）。

rgya-mts'o' (rgyam-ts'o)， “佳木磋”（海）。

klu mts'o (lum-ts'o)， “鲁木磋”（纳加海，龙海）。

glo mč'iā (lom-č'in)， “罗木沁”（肝）。

rta rdzi (tur-dzi)， “达尔子”（牧马人）。

rta rgod (tar-god), “达尔果特” (野马)。

mgo mt'o (gom-t'o), “郭木托” (高山巖)。

a-bkra (ab-ta), “阿布扎” (满语为abja)。

mts'o-lidñ (ts'ol-diñ, 不是mts'o lo lidñ, 象察赫曾两次所写那样, 见卷三, 第134页), “磋罗定”。

但是: rdo hzañ (do ču), “多桑”。

bu bčü (bu čü), “布珠” (又“布究”——译者)。

mi dpon (mi pon), “密本”。

ryu mts'o (yu ts'o), “裕盛” (又“雍木错”——译者)。

浊声母和清音母, 不论送气和不送气的, 只要后面跟着字母r (ra-btags), 那么, 除了浊、清的唇音而外, 看来都会有转变为舌尖中音组系 (cerebral series) 的情况:

bkra “扎” (čü)。

k'ra “察” (č'a), k'ri “赤” (č'i), kr'o “绰” (č'o), k'rus “垂” (č'ui), k'rob “绰布” (č'o-pu)。

[可与德西德里Desideri的音译k'rod为trō, k'ri为trī相比较]。

grub “珠布” (čü-pu), grum “珠木” (čü-mu), groñ “庄” (čuañ),

gri “济” (č'i), agram “扎木” (č'a-mu), mgron和sgron “准” (čun)。

[与德西德里比较: gruañ转写为trang, grub-pa转写为trubba, agra-ba转写为drowa。]

p'ra “察” (č'a), ap'rañ “昌” (č'añ)。

dre “德” (tō, 此字也译写为bde), dru “珠” (čü), druñ “中” (čuañ),
drin “真” (čōn)。

然而: brag “巴喇克” (pa-la-ku满语为pobarañ), qhrog “博罗克” (po-lo-ko)。

[与德西德里比较: qbras-bu译写为breepa。]

spriu “必林” (pi-lin)。

还应注意srid “锡里特” (si-li-t'ō, 满语为sirit)。

汉文没有舌尖中音 (cerebrals), 故分别以舌而中音 (palatals) 或舌尖前音 (dentals) 译写特殊的藏语音音。¹¹¹

韵尾g, b, d, 和l的发音如下: 韵尾g以“克”表示, 如gog, læag-s, stag, nags, ug; 韵尾b以“布”表达, 如skyab-s, skyib-s, rgyab, hya-ma-leb (蝴蝶); 韵尾d以“特”代表, 如bkod, skyid, brgyad, stod, t'od, dud, gnod, od; 韵尾l, 以“勒”表示, 如dkyil, agul, rgyal, yul。在这些地方, 我们是不宜于得出一般的结论的, 因为往往有这样一种可能: 在西藏地名中还保存着古代僵化了的语音形式。

韵尾s不发音并且影响词干元音 (the stem-vowel), 使它念时声音延长, 或变成带i的双合元音 (i-diphthong):

ryas (yai) “雅衣” (ya-i)。

在bsam-yas一词中的yas (yai) “崖” (yai)。

sñas (nai) “爱” (nai)。

dños (ñoi) “卫” (wei, 满语为oi)。

ē'os (ē'oi) “吹” (ē'ui, 满语为čoi)。

dus (dui) “堆” (tui, 满语为dui)。

adus (dui) “堆” (tui)。

mdzes-po (dze-po) “译博” (tsō-po, 满语为tseiba)。

smos (mōi) 梅。

[与德西德里比较：以Sang-ghie译写Sañs-rgyas，以Kiepu译写skyes-po，以soo译写sos，以tuu译写bsdus，以lee译写ias，以nee译写gnas，又欧拉兹欣(Orazio della Penna)；以c'iō译写ē'os；《藏文字母》(Alphabetum Tibetanum)；以re译写ras，以sre译写sras。]

遵照乾隆皇帝圣谕印行的四体字典(满、藏、蒙、汉)中虽有相当多的藏语中的汉语借词，但却没有按照一种合理的音译方式转写。本文词汇中有引自《四体文鉴》的，此外《华夷译语》的藏语部分本文对之也有所采用。

施密德和波特林克提到一种用藏、蒙、汉三体文字编写，并用汉文格式印刷的《药物表》(sman sna ts'ogs-kyi miñ ē'ad)。¹¹²在1882年，贝列史奈德(E. BRET SCHNEIDER) 对一个有365种药物的表作过相当准确的叙述，此表以藏、汉两种文字列名，汉文的语音用藏文字母标注。¹¹³贝列史奈德在北京开设的“万恭号”店铺，负印刷此小册子之责；此店铺或基于其自身的商业利益的考虑，曾发行过一种印有该店徽记的特别重印本。此种本子我从未得见，但是知道有两种版本——一为汉文版，一为藏文格式印刷的版本——已为“高祝寺”附近藏文印经处出版，这两种版子的书我这里都有。¹¹⁴这两种版本的书我还在不列颠博物馆和柏林皇家图书馆看到过。这一小部著作首先引起我的注意，是在1900年，我的兄弟和我合作从事西藏医学研究的时候。¹¹⁵随后我整理出一份有关西藏医学的精密原文资料，并且还继续对其中大部分技术术语进行鉴定，——这是一种相当地取决于环境才能做好的工作，在1901年我在北京碰到一个大量搜集这些药物的机会，这对我的鉴定工作很有利。¹¹⁶上述药名表对编藏文字典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因其中有许多是我们现在通用的字典中所没有记录的词，而且有些词看起来貌似汉文，但实际上至今都还不能断定其身分。然而对后一个问题，多少抱一种批判的态度是必要的，因为条目中的藏、汉语对等词并不都是绝对相等的；有些情况反近乎相似，有些情况则肯定是错误。¹¹⁷

在1908年，出现了波兹德纳耶夫(A. Pozdnäyev)译自蒙文《四医学经》(The Four Medical Tantra)，mon-nag-gi rgyud中之一的第一卷译文。¹¹⁸在该译文的第247—301页上，我们看到有381种药的一张表，其中的药名用藏、蒙两种文字书写，而汉文的对等词则在脚注栏中标注。后者系波兹德纳耶夫从上述北京版本里提取出来的，他曾经充分地声明，这个版本中的目录和他的原文对照，除了最后附加之处而外，是全部一样的。幸而有了他出版的这份材料，才使我免除了我自己发表一份词汇表的计划，虽然在名称的鉴定工作方面他并没有做过些什么。他的著作立刻表明了上述藏、汉药方的材料来源。所以，“万益号”是无权把这份著作的开创者的身分归之于自己的。事实上，此药方书源于一份藏文蒙文书写的医学标准著作，所以看来藏文本就是原著，而汉